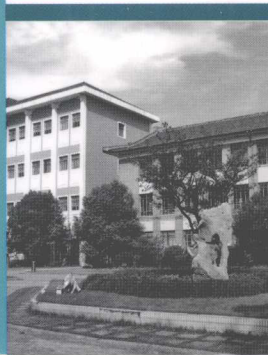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傅蓉蓉/著

走向盛宋

——北宋前期南方经济圈形成与文学转型

On the Way to Glorious Age of
Song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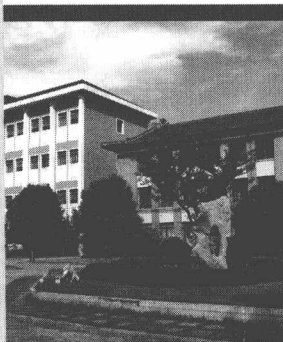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傅蓉蓉/著

走向盛宋

——北宋前期南方经济圈形成与文学转型

On the Way to Glorious Age of
Song Dynasty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盛宋:北宋前期南方经济圈形成与文学转型/傅蓉蓉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1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7-5112-1011-1

I. ①走… II. ①傅…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宋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3059 号

走向盛宋——北宋前期南方经济圈形成与文学转型

作 者:傅蓉蓉 著

出版人:朱 庆

终审人:武 宁

责任编辑:田 苗 祝 菲

封面设计:小宝工作室

责任校对:李 喆 王灵芝

责任印制:曹 净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45(咨询),670789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 gmch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690mm×975mm 1/16

字 数:260千字

印 张:14.25

版 次:2011年2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1011-1

定 价: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 录

引论 北宋前期文学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 1

上编 北宋前期南方经济圈形成与宋代文学转型的基础环境 / 6

第一章 北宋前期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缘由 / 6

第一节 自然条件的变迁 / 6

第二节 汴梁为都的经济意义 / 27

第三节 经济重心南移的社会基础——人口迁徙 / 29

第二章 经济圈形成的标志 / 33

第一节 三大经济集群的形成 / 33

第二节 聚族而居的大家庭格局在南方地区广泛形成 / 62

第三节 南方经济贡献度分析 / 64

中编 南方经济圈的文化影响 / 68

第三章 经济重心南移带来的文化心理影响 / 68

第四章 南方教育发展状况及其文化影响 / 77

第一节 南方基础教育状况描述 / 77

第二节 北方学校制度与北方教育观念 / 86

第五章 南方书籍印刷与收藏对知识普及的影响 / 93

第一节 五代以来南方官方藏书与民间藏书状况 / 93

第二节 杭州书坊、闽地书肆的运作与学术传播 / 95



第六章	文化普及对南方文人群体形成的影响	/ 97
第一节	南方文人集团的崛起	/ 97
第二节	进入统治核心的南方文人对宋初主流文化格局的影响	/ 147
第三节	南方文人群体对主流文化圈的影响	/ 159
下编	经济重心南移与文学转型的互动关系	/ 172
第七章	宋型诗的初步建构	/ 172
第八章	宋文创作中的“务实”取向	/ 191
第九章	科举与文学之互动	/ 195
第一节	文体之争与文化之争	/ 195
第二节	欧阳修与南北文化融合	/ 199
结 语		/ 215
主要参考书目		/ 216



引论

北宋前期文学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宋型文学是指以宋代社会和文化为背景的，以新儒家思想为核心，注重理性，追求博洽，突破传统审美惯性的一种文学类型，与唐型文学形成鲜明的对比。文学类型的迁移变化与唐宋之间社会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南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北宋最初百年间南方经济的全方位崛起，以及这种崛起带来的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价值取向、人文素质的变化是宋型文学建构过程中最不可忽视的一种推动力，详细地分解这种推动力，我们将能够为中国文学中最重要的一次文学转型找到关键性的锁匙。

本书研究所涉的“北宋前期”指宋兴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至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南方”地域范围则限于北宋至道三年划定的天下十五路中的江南、两浙、福建以及广南东诸路，这也是传统中原视点中的南方之地。这既是一个经济社会概念，也是一个区域文化概念。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只有在这一时期，上述区域的经济发展的状况才可圈可点，自魏晋时期第一次南方大开发之后，整个南方地区的经济基本都处于缓慢上升通道中，在长江下游实际上已经存在着一些经济和文化水准较高的城市，包括扬州和江宁（南京）。如《江南通志》引《元和志》称扬州：“扬州之俗号为繁侈”；引《通典》论江宁曰：“永嘉之后衣冠萃止文，艺儒术于斯为盛”。然而原本这些城市的个体力量虽强，但不足以成为王朝经济体系的支撑点，因而其整体文化影响力也偏于薄弱。到了北宋前期，随着南方更大区域范围内经济的广泛崛起，老牌发达城市与新兴经济集合体构成的合力不仅使长江南岸及东南沿海成为整个国家新的经济依靠，而且，对于文化建构更能输送全方位的养料，形成多元化作用。

“经济圈形成”是一个动态概念，其表征是区域内部具有比较明显的同质性与群体性，与区域外部有着比较明确的组织和地域界限。这类经济集群的形成既有自然整合的力量——体现为地域优势互补，又有一定的人为规划——注



重产业交叉和区域经济合作。与同时期的北方地区相比，“南方”城市化程度更高，产业类型更先进，相应的带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学人才的产生也开始活跃，并且在唐宋文学转型的枢纽期成为了重要推动力。

本书论及的“文学转型”是指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转变过程中传统诗文中出现的新质，表现在文学流派形成、创作实践及理论批评诸方面。这些新质有的虽自晚唐五代以来开始孕育，但当时尚处萌芽阶段，到北宋前期才逐渐定型，并且直接为稳定而且个性鲜明的新型文学样式产生提供了关键基因组。

在全面论述这一命题前，我们必须梳理一下前人的研究成果，以求温故知新。首先从相关文学研究的层面上来看：

在当前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将文学的演变与当时某一种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关联起来加以考察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研究方式。在对宋初百年的文学进行探索时，学者们自不例外，他们自觉地以唐宋之际社会转型为背景，将宋初文学置于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背景下加以探求，发现其生长、发展的内在因子和外部土壤之间的联系。

例如沈松勤先生的《北宋文人与党争》一书在论及北宋初年文人群体的状况时，对该群体的政见之争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考察，从党争的角度解读文学事件。又如曾祥波先生2004年5月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论文《从宋初政治的崇文倾向看宋诗气质的形成》中论证了由于赵宋王朝太宗、真宗重倡崇文之治，在职官制度层面恢复、加强了对知制诰、翰林学士等“内外制”词臣的重视。因此，兴起了宋初诗坛的“白体”之风，使得宋诗呈现出了一种矜持、从容、闲适、成熟的“中年气质”。这也是比较少见的从职官制度层面对宋初诗风的分析。再如，任元彬先生发表于《复旦学报》2004年第二期的论文《宋初诗歌与禅宗》则从晚唐五代以来禅宗思想与文学融合的角度出发，考察其对宋初文人士大夫的人生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指出他们恬淡宁静的心境追求和感伤低沉的情绪来源于禅宗。

对宋初诗学的体派研究也日趋热烈：就宋初三体——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而言，专门性的论文与著作甚多。其中有代表性者如张海鸥先生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六期上的《宋初诗坛“白体”辨》全面论述了“白体诗”的由来、特质和在文坛上流行原因，是较早研究白体诗的专题性论文。关于“晚唐体”，比较有特色的论述当属木斋先生在《宋诗流变》一书中提到的，其长处在于考察了晚唐体与江西诗派及姜夔之间的关系，有所创见。对西昆体的研究，在宋初三体中是最为集中的。远的不论，在80年代，就有



两个《西昆酬唱集》的注本相继问世。注者一为郑再时，一为王仲萃。郑氏注本早在30年代已完成，此时根据油印本重出。王氏注本完成亦较早，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从宋史研究的角度出发，以史证诗，以诗补史，独具慧眼地看到了西昆体诗的史料学价值。这两部书的出版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不可或缺文本材料。进入90年代，对于西昆体的研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吴小如先生于《文学评论》1990年2月号上发表的《西昆体评议》首次眼光独到地指出欧阳修早期作品中有摹仿西昆体的痕迹，所以不应在两者之间划出鸿沟；而且作为宋诗开山祖师黄庭坚也“多多少少地继承了西昆体衣钵”。这种评价事实上给了昆体在宋诗发展进程中一个合法的居留身份。

在这一阶段，更为值得重视的是各种关于宋代诗学的著作对于西昆体的评价和论述，他们视角不同，时有新见。如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第一章“宋诗分体和诗派”中论及西昆文字不长，但它肯定了“西昆体的突然出现，改变了宋诗的复古进程”；同时指出昆体诗人中的大部分人或原为白体诗人，或与晚唐体诗人交往甚密。所论虽不详，却启发人们重新审视宋初宗唐三派之间的诗学渊源。此外，在这一章节中，对于后期的西昆体诗人的创作情况也略有述及，将西昆诗人的考察范畴扩大了，也使这一流派的发展演变显得更为完整。而王运熙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史》中《宋金元文学批评史》里“杨亿与西昆体”一节中，论者从杨亿“忠清鲠亮”的人格境界切入分析以杨亿为首的昆体诗人何以对李商隐诗情有独钟。并且指出“禁中唱和”这一背景对西昆体形成“懿”、“雅”、“雕章丽句”等风格的影响，并且，由杨亿而及后期昆体诗人晏殊，将昆体诗学思想的流变作一个简单而不失科学的勾勒。21世纪以来学术界不仅在理论上对西昆体的评判有了明显的变化，对昆体诗人的研究也更上一层楼，日本学者池泽滋子完成的《丁谓研究》，运用“知人论世”的传统方法对宋初诗人丁谓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其中丁谓同西昆派诗人关系一节写得鞭辟入里，将丁谓和西昆体的因缘际会和观念分歧解析得淋漓尽致，此书虽非专论西昆，但有此一节，足以为治西昆者澄清一些悬疑。李一飞的《杨亿年谱》则运用了详实的资料，对于西昆体诗人之翘楚杨亿的生平历作了细致勾勒。鉴于西昆派是宋初文学中最重要的诗学流派，上述研究对重新认识宋初诗学的价值有积极的贡献。

对于宋初骈文与散文的研究也有不少论著。曾枣庄先生的《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过程》、《论宋代的四六文》、《论宋赋诸体》均有创见。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祝尚书先生《北宋“太学体”新论》一文重新考察了太学体的演变过



程、文体形态、特征及其在宋代文体发展链条中的位置和作用，以及它与庆历年间急功近利的浮躁士风的关系，令人耳目一新。

其次，由于本课题涉及到经济史领域，所以对宋代经济史研究的现状也略做一番盘点。

从专门史的角度看，早在30年代，宋史研究的大家张家驹先生就发表了论文《宋代分路考》，他在五六十年代所著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堪称这一领域中的开山之作。戴裔煊先生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一书则对宋代盐的生产、运销和钞盐制的沿革作了相当深入的论述。70年代以后，我们可以读到李埏先生的《〈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庄园和矛盾》等文，文章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重点研究宋代货币等经济问题。关履权先生《宋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增订本）则重点关注了宋代广州作为一个重要口岸的对外贸易发展历程。朱家源先生对宋代土地制度素有研究，撰有《谈谈宋代的乡村中户》，与之研究领域相近的还有酆家驹先生，他的代表作有《两宋时期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如果说，上述几位都是活跃于五六十年代，取得重要成就的宋代经济研究前辈学者的话，漆侠先生可以说是20世纪晚期足以成为领军人物的宋代经济史大家。他在80年代出版的《宋代经济史》对宋代农业生产、土地关系、手工业发展、国家专利制度、商业和城市经济、对外贸易、货币及经济思想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和论述，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其中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涉及宋初经济活动，是本课题研究中可资参考的重要材料。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着重于制度的阐释，从宋朝各代财政史的发展沿革、财政收支和财政管理体制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也很有参考价值。王曾瑜的《宋朝阶级结构》从宋代乡村户与坊郭户、官户与民户等对称户名中，提出户口分类制度的概念，并通过户口分类，论述宋代的社会阶级。其中关于户口分类的依据等内容可作为借鉴。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灵活运用历史研究传统的实证主义原则及区域经济、广义社会史学等研究手法对宋代江南社会经济的诸层面进行了系统考察，令人信服地对江南地区的生态演变、农田水利、经济开发、移民定居、城市发展、社会流动、商业交通、户籍税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本课题研究南方经济圈有相当的指导作用。

从分业研究的角度来看，郭正中先生的《宋代盐业经济史》和李华瑞先生的《宋代酒的生产 and 征榷》是两部重要著作，盐业和酒业不仅是宋代手工业的两个重要部门，也是国家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



两书史料丰富，论述详备。王菱菱的研究专注于宋代矿业，发表了《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等一系列论文。在商业方面，姜锡东的《宋代商业信用研究》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此书从赊买、贷款、牙人和担保、交引和交引铺、榷货务等诸方面，论证了宋代商业信用从消费领域扩展到了生产和流通领域。林文勋的《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和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两书，着重论析了宋时两个重要的地区性市场。刘秋根在《两宋私营高利贷资本》等文的基础上，撰成《中国典当制度史》的专著，对古代一种特殊的金融业，作了系统论述。宋代无疑是中国货币史的重要阶段，前辈学者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是少见的质量较高的专史，其中对宋代的货币和货币思想作了较系统介绍。

综上所述，对于北宋前期社会、文化与文学的分类研究已有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能兼顾文学与经济史，打破学科界限，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进行宏观研究，由大文化着眼，同时完成对文学自身规律探究的著作尚有缺失。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诸多学者习惯于将隶属于物质层面的经济模式、经济制度的变化与精神层面的文学体制、艺术规律和创作审美的转型割裂开来，或仅将经济因素当成文学研究的社会背景中的一端来加以附着，本课题的研究旨在突破这些惯例，更客观地寻找并发现文学创新与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共振规律。



上编

北宋前期南方经济圈形成与宋代文学转型的基础环境

第一章

北宋前期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缘由

第一节 自然条件的变迁

宋初南北经济都进入了新一轮的发展，但这种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南方似乎突破了常规，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通道，这就逐渐打破了中国传统经济北强南弱的基本格局。在这背后自然条件的变迁是一个基础原因。

程遂营先生说：“唐宋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一是时间上的演进。经历了隋、唐、五代、北宋，达五百年之久。二是空间上的变化。中国社会的政治、军事、文化重心由关中、伊洛的长安、洛阳，逐渐东移到开封；经济、人口重心则由黄河中下游地区渐次向东南、南方转移。三是在时间、空间变化的大背景下，带来了中国唐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巨大变迁。”^① 这段概括清晰地阐述了由唐到宋数百年间中国社会中“南方”这个地域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这一过程首先开始于自然条件的演变。

^① 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242页。



如果加以抽象地概括，我们可以说，自汉代以后，中国北方自然环境每况愈下，土地荒漠化程度日趋严重。而且中唐以后，特别是进入五代十国，随着全球气候干冷期的到来，中国北方自然环境日益恶化。广袤的北中国大地在承载了汉唐两代政治中心和急剧增长的人口之后，逐渐失去了充分的造血能力，开始变得虚弱。荒漠化加剧了所有生活在中国北方的民族的生存危机。有一个鲜明的例证是：古城长安原是八水环绕，可后来除了泾水，渭水，其余六水相继干涸，于是在中唐后逐渐弱化了作为政治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日益衰落。迁徙和改变生活方式是他们面临危机时的几乎唯一的选择。从这些角度看，北方民族向南迁徙，某种程度上是气候变异的结果，也是不得已为之。

与此相对，自隋唐以后，中国的南部地区经济逐渐发达，因为自然气候和地势原因，使得南方的水资源要比北方丰富许多，同时温度和其他自然条件也使南方的复种指数要高于北方。同样，由于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又使南部成为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江河下游形成的广袤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是农业最佳的地区。这些自然条件都决定了南方适合农业生产，生存环境要比北方优越得多。

我们的具体分析将围绕宋初百年之际北方干旱等灾害性气候增多，水资源短缺，土壤条件退化和北方人口密度居高不下等问题展开，正是这些原因给北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荷，使之出现滞涨，甚至有所退化。

（一）灾害性气候统计

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隋唐五代到北宋初年（约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中国大陆的气候逐渐由温暖期向寒冷期过渡，在公元1000年后进入中国近5000年来的第三个寒冷期^①。在这样的气象背景下，我们发现，对于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而言，其影响是无法忽略的。特别是在纬度较高的北方地区，随着气温每下降1℃，农作物的生长期明显拉长15~20天，年降雨量也要相差50~150毫米。^②这样一来，黄河流域的农业经济就受到了明显的打击，产量降低无法避免。

更何况，在过渡期和寒冷期的最初阶段，灾害性气候出现的频率明显加快，而灾及北方者尤甚。

以下列表显示的是宋初百年范围内自然灾害的基本情况，全部资料出自

^①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② 《全球变化和中国历史发展》，《华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5期。



《宋史·五行》，当然因为各种灾害的发生时间，次数不同，列表中呈现的统计时间长度也各有差异。

首先是气候温寒过渡时期最容易发生的雪灾和雹灾。

雪灾	建隆三年春	962	延、宁二州雪盈尺，沟洫复冰，草木不华。丹州雪二尺。
	太平兴国七年三月	982	宣州霜雪害桑稼。
	雍熙二年冬	985	南康军大雨雪，江水冰，胜重载。
	端拱元年闰五月	988	郢州风雪伤麦。
	淳化三年九月	992	京兆府大雪害苗稼。
	淳化四年二月	993	商州大雪，民多冻死。
	咸平四年三月	1001	京师及近畿诸州雪，损桑。
	天禧元年十一月	1017	京师大雪，苦寒，人多冻死，路有僵尸，遣中使埋之四郊。
	天禧二年正月	1018	永州大雪，六昼夜方止，江、溪鱼皆冻死。
	庆历三年十二月	1043	大雨雪。
	至和元年正月	1054	京师大雪，贫弱之民冻死者甚众。
	嘉祐元年正月	1056	甲寅朔，御大庆殿受朝。前一日，殿庭设仗卫既具，而大雨雪折宫架。是日，帝因感风眩，促礼行而罢。壬午，大雨雪，泥途尽冰。都民寒饿，死者甚众。

从上述列表可以清楚地知道：雪灾根据粗略统计，从公元962年到公元1056年的95年中各地累计遭受雪灾侵害的地区有12处，其中河南占41.67%，陕西占16.67%，北方地区总共受灾10处，占83.33%，南方地区仅有2处，占16.67%。

风雹	建隆元年十月	960	临清县雨雹伤稼。
	建隆二年七月	961	义川、云岩二县大雨雹。
	建隆四年七月	963	海州风雹。
	乾德二年四月	964	阳武县雨雹。宋州宁陵县风雨雹伤民田。
	乾德二年六月	964	潞州风雹。
	乾德二年七月	964	同州合阳县雨雹害稼。
	乾德二年八月	964	肤施县风雹霜害民田。



续表

	乾德三年四月	965	尉氏、扶沟二县风雹，害民田，桑枣十损七八。
	开宝二年	969	风雹害夏苗。
	太平兴国二年六月	977	景城县雨雹。
	太平兴国二年七月	977	永定县大风雹害稼。
	太平兴国五年四月	980	冠氏、安丰二县风雹。
	太平兴国七年五月	982	芜湖县雨雹伤稼。
	太平兴国八年五月	983	相州风雹害民田。
	端拱元年三月	988	霸州大雨雹，杀麦苗。
	端拱元年闰五月	988	润州雨雹伤麦。
	淳化元年六月	990	许州大风雹，坏军营、民舍千一百五十六区。鱼台县风雹害稼。
	至道二年十一月	996	代州风雹伤田稼。
	咸平元年九月	998	定州北平等县风雹伤稼。
	咸平三年四月	1000	京师雨雹，飞禽有陨者。
	咸平六年四月	1003	京师暴雨雹，如弹丸。
	大中祥符三年	1010	京师雨雹。
	大中祥符五年八月	1012	京师雨雹。
	天禧元年九月	1017	镇戎军彭城砦风雹，害民田八百余亩。
	天圣六年	1028	京师雨雹。

从公元960年到公元1028年的69年中，累计受到风雹灾害的地区有20处，受灾最多的仍是河南，受灾共8次，占40%，其次为河北，共4次，占20%，整个北方地区共遭受风雹灾害19次，占95%，而南方地区仅有福建受灾一次，占总量的5%。

其次，旱灾。有研究资料表明，在气候转冷的过程中，干旱发生的几率要远远大于普通年份。在这百余年中，中国北方多次遭到了旱灾的侵扰。

旱灾	建隆二年	962	京师夏旱，冬又旱。
	建隆三年	963	京师春夏旱。河北大旱，霸州苗皆焦仆。又河南、河中府、孟、泽、濮、郛、齐、济、滑、延、隰、宿等州并春夏不雨。



续表

建隆四年	964	京师夏秋旱。又怀州旱。
乾德元年冬	963	京师旱。
乾德二年正月	964	京师旱。夏，不雨。是岁，河南府、陕、虢、麟、博、灵州旱，河中府旱甚。
乾德四年春	966	京师不雨。江陵府、华州、涟水军旱。
乾德五年正月	967	京师旱；秋，复旱。
开宝二年夏至七月	969	京师不雨。
开宝三年春夏	970	京师旱。邠州夏旱。
开宝五年	972	春，京师旱；冬，又旱。
开宝六年冬	973	京师旱。
开宝七年	974	京师春夏旱；冬又旱。河南府、晋、解州夏旱。滑州秋旱。
开宝八年春	975	京师旱。是岁，关中饥，旱甚。
太平兴国二年正月	977	京师旱。
太平兴国三年春夏	978	京师旱。
太平兴国四年冬	979	京师旱。
太平兴国五年	980	夏，京师旱；秋又旱。
太平兴国六年春夏	981	京师旱。
太平兴国七年春	982	京师旱。孟、虢、绛、密、瀛、卫、曹、淄州旱。
太平兴国九年	984	夏，京师旱。秋，江南大旱。
雍熙二年冬	985	京师旱。
雍熙三年冬	986	京师旱。
雍熙四年冬	987	京师旱。
端拱二年五月	989	京师旱。
端拱二年秋 七月至十一月	989	上忧形于色，蔬食致祷。是岁，河南、莱、登、深、冀、旱甚，民多饥死，诏发仓粟贷之。
淳化元年正月至四月	990	不雨，帝蔬食祈雨。河南、凤翔、大名、京兆府、许、沧、单、汝、干、郑、同等州旱。
淳化二年春	991	京师大旱。



续表

淳化三年	992	春, 京师大旱; 冬, 复大旱。是岁, 河南府、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及亳建淮阳等三十六州军旱。
淳化四年夏	993	京师不雨, 河南府、许汝亳滑商州旱。
淳化五年六月	994	京师旱。
至道元年	995	京师春旱。
至道二年春夏	996	京师旱。
咸平元年春夏	998	京畿旱。又江浙、淮南、荆湖四十六军州旱。
咸平二年春	999	京师旱甚。又广南西路、江、浙、荆湖及曹、单、岚州、淮阳军旱。
咸平三年春	1000	京师旱。江南频年旱。
咸平四年	1001	京畿正月至四月不雨。
景德元年	1004	京师夏旱, 人多渴死。
景德三年夏	1006	京师旱。
大中祥符二年春夏	1009	京师旱。河南府及陕西路、潭、邢州旱。
大中祥符三年夏	1010	京师旱。江南诸路、宿州、润州旱。
大中祥符八年	1015	京师旱。
大中祥符九年秋	1016	京师旱。大名府、澶州、相州旱。
天禧元年	1017	京师春旱, 秋又旱。夏, 陕西旱。
天禧四年春	1020	利州路旱。夏, 京师旱。
天禧五年冬	1021	京师旱。
天圣二年春	1024	不雨。
天圣五年夏秋	1027	大旱。
天圣六年四月	1028	不雨。
明道元年五月	1032	畿县久旱伤苗。
明道二年	1033	南方大旱。
景佑三年六月	1036	河北久旱, 遣使诣北岳祈雨。
庆历元年九月	1041	丁未朔, 遣官祈雨。
庆历二年六月	1042	祈雨。
庆历三年	1043	遣使诣岳渎祈雨。
庆历四年三月	1044	遣内侍两浙、淮南、江南祠庙祈雨。



续表

	庆历五年二月	1045	诏：天久不雨，令州县决淹狱，又幸大相国寺、会灵观、天清寺、祥源观祈雨。
	庆历六年四月	1046	遣使祈雨。
	庆历七年正月	1047	京师不雨。
	庆历七年二月	1047	遣官岳渎祈雨。
	庆历七年三月	1047	西太乙宫祈雨。
	皇祐元年五月	1049	遣官祈雨。
	皇祐三年	1051	恩、冀诸州旱。三月，分遣朝臣诣天下名山大川祠庙祈雨。

根据统计，自公元961年到公元1051年的91年间，各地旱灾累计发生次数为63次，其中拔得头筹者仍是河南，竟有44次之多，占总量的69.84%，整个北方地区累积发生旱灾58次，占92.06%，南方地区仅有5次，占7.94%。

再次，我们来看下虫灾。应当说，这种灾害的起因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气候的干旱则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蝗灾	建隆元年七月	960	澶州蝗。
	建隆二年五月	961	范县蝗。
	建隆三年七月	962	深州蝻虫生。
	建隆四年六月	963	澶、濮、曹、绛等州有蝗。
	建隆四年七月	964	怀州蝗生。
	乾德二年四月	964	相州蝻虫食桑。
	乾德二年五月	964	昭庆县有蝗，东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是时，河北、河南、陕西诸州有蝗。
	乾德三年七月	965	诸路有蝗。
	开宝二年八月	969	冀、磁二州蝗。
	太平兴国二年闰七月	977	卫州蝻虫生。
	太平兴国六年七月	981	河南府、宋州蝗。
	太平兴国七年四月	982	北阳县蝻虫生，有飞鸟食之尽。滑州蝻虫生。是月，大名府、陕州、陈州蝗。